

# 即刻主义

Hakim Bey

1994

# 目录

被束缚的本体论无政府状态	5
即刻主义	9
1	10
2	11
3	12
4	13
5	14
6	15
7	16
8	17
9	18
10	19
11	20
12	21
13	22
14	23
15	24

16	25
堂/帮	26
即刻主义对抗资本主义	30
内卷	34
想象力	38
Lascaux	42
正式开始前	45
“原始视觉”	48
即刻主义者的赠礼节	51
1	52
2	53
3	54
4	55
5	56
6	57
7	58
8	59

9	60
沉默	61
倾听者的批判	64

# 被束缚的本体论无政府状态

因为对于“事物的真实本质”，绝对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真正确定地断言，所以所有项目（如尼采所说）只能“建立在任何东西之上”。然而，必须有一个项目——如果仅仅是因为我们自己拒绝被归类为“一无所有”。我们将无中生有：起义，反抗一切宣称：“事物的本质是这样的”。我们不同意，我们不自然，在法律的眼中，我们几乎一无所有——神法、自然法或社会法——任你选择。我们将凭空想象我们的价值观，通过这种发明行为，我们将生活。

当我们对无所事事进行调解时，我们注意到虽然它无法定义，但自相矛盾的是，我们可以对它说些什么（即使只是比喻）：——它似乎是一个“混沌”。作为古老的神话和“新科学”，混沌是我们项目的核心。大蛇（提亚马特、蟒蛇、利维坦），赫西奥德的原始混沌，在所有国王、祭司、秩序、历史、等级制度和法律的代理人面前主持着旧石器时代的广阔漫长的梦想。“无”开始呈现出一张脸——混沌先生光滑、毫无特色的鸡蛋或葫芦面貌，混沌如生成，混沌如过度，无所事事的慷慨倾注。

实际上，混沌就是生命。所有的混沌，所有的色彩，所有的原生质紧迫性，所有的运动——都是混沌。从这个角度来看，秩序表现为死亡、停止、结晶、异邦人的沉默。

无政府主义者多年来一直声称“无政府状态不是混沌”。甚至无政府主义似乎也需要一种自然法则，一种内在和与生俱来的物质道德，一种能量或存在目的。（在这方面并不比基督徒好，至少尼采相信——激进的只是在他们怨恨的深处。）无政府主义说“国家应该被废除”，只是为了建立一种新的更激进的秩序形式来取而代之。然而，本体无政府状态回答说，没有“状态”可以在混沌中“存在”，所有本体论的主张都是虚假的，除了混沌的主张（然而这是不确定的），因此任何形式的治理都是不可能的。“混沌从未消亡。”任何形式的“秩序”，我们没有为了我们自己的庆祝目的而在纯粹的“存在自由”中直接和自发地想象和产生——都是一种幻觉。

当然，幻想可以杀人。惩罚的图像萦绕在秩序的睡眠中。本体无政府状态建议我们醒来，并创造我们自己的一天——即使在国家的阴影下，那个沉睡的脓肿巨人，其秩序的梦想变成了壮观的暴力痉挛。

唯一足以促进我们的创造行为的力量似乎是欲望，或者正如查尔斯·傅立叶所说的那样，“激情”。就像混沌和厄洛斯（以及地球和旧夜）是赫西奥德的第一批神灵一样，在它们的宇宙吸引力圈之外也没有人类的努力发生。

激情的逻辑得出结论，所有“状态”都是不可能的，所有“秩序”都是虚幻的，除了欲望的那些。没有存在，只有生成——因此唯一可行的政府是爱，或“吸引力”。文明只是隐藏了自身——在理性的静态薄纱背后——只有欲望才能创造价值的真理。所以文明的价值观是基于对欲望的否定。

声称通过再生产欲望来产生秩序的资本主义，实际上起源于稀缺性的生产，只是在不满、否定和异化中再生产自己。随着景观的解体（就像一个故障的 VR 程序），它揭示了商品（Commodity 的）无肉骨头。就像爱尔兰童话故事中那些出神入睡的旅行者一样，他们访问了另一个世界，似乎在享用超自然的美味佳肴，我们在昏暗的黎明中醒来，嘴里含着灰烬。

个人与群体——自我与他人——一种错误的二分法通过控制媒介传播，尤其是通过语言传播。爱马仕——天使——媒介是信使。所有形式的交流都应该是天使般的——语言本身应该是天使般的——一种神圣的混沌。相反，它感染了一种自我复制的病毒，一种无限的分离水晶，一种阻止我们一劳永逸地杀死 Nobodaddy 的语法。

自我与他者相辅相成。没有绝对的范畴，没有自我，没有社会——只有混沌复杂的关系网络——以及“奇怪的吸引力”，即吸引力本身，它在生成的流动中唤起共鸣和模式。

价值从这种动荡中产生，价值基于丰富而不是稀缺，基于礼物而不是商品，基于个人和群体的协同和相互增强；——在各方面都与道德和伦理相反的价值观念文明，因为它们关乎生而不是死。

“自由是一种心理动力技能”——不是抽象名词。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状态”——一个运动，而不是一种治理形式。死亡之地知道完美的秩序，有机体和有生命的生物在恐惧中收缩——这解释了为什么滑倒文明有一半以上爱上了安逸的死亡。从巴比伦和埃及到 20 世纪，权力的建筑永远无法与墓地的坟墓区分开来。

游牧和起义为我们提供了本体无政府状态“日常生活”的可能模型。当我们将文明和革命的结晶完美体验作为战争的形式时，我们不再感兴趣，它们是疲惫的旧巴比伦骗局的变体，稀缺的神话。就像贝都因人一样，我们选择了一种由皮肤构成的建筑——以及一个充满消失之地的地球。就像公社一样，我们选择了一个充满庆祝和风险的流动空间，而不是工作的棱镜（或监狱）的冰冷浪费、失去的时间的经济、对合成未来的怀旧之情。

乌托邦诗学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的欲望。乌托邦之镜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批判理论，无论是实践政治还是系统哲学都无法指望它进化。但是我们没有时间讨论那些仅仅将乌托邦视为“无处可去”的理论，同时哀叹“欲望的不可能”。奇妙对日常生活的渗透——“情境”的创造——属于“物质身体原则”，属于想象，属于当下的生命结构。

意识到这种直接性的人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扩大快乐的圈子，只需从“幽灵”的催眠中醒来（正如施蒂纳所说的所有抽象）；“犯罪”还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更重要的是，自我在性方面的加倍。从施蒂纳的“唯一者的联盟”，我们进入尼采的“自由精神”圈子，再到傅里叶的“激情系列”，即使他者在群体的爱欲中自我繁殖，我们也会不断加倍。

正如我们这些可怜的 PoMo 混蛋所知道的那样，这样一个团体的活动将取代 Art。无偿的创作，或“玩”，礼物的交换，将导致艺术作为商品的再生产而消亡。“达达认识论”将融化一切的分隔，重生一种精神上的旧石器主义，在其中生命和美丽已经无法区分了。这种意义上的艺术在整个高历史中一直被伪装和压制，但从未完全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一个最喜欢的例子：绗缝蜜蜂——一种由无等级的创意集体进行的自发图案化，以产生独特、有用和美丽的物体，通常作为礼物送给与圈子有联系的人。

即刻主义组织的任务可以概括为扩大圈子。我生命中可以从工作/消费/死亡循环中解脱出来的部分越多，并且（重新）转向“蜜蜂”的经济，我获得快乐的机会就越大。因此，挫败

机构的吸血鬼能量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风险本身构成了快乐的直接体验的一部分，这一事实  
在所有起义时刻——所有化妆的时刻——强烈的冒险享受中都被注意到：——起义的节日方面，  
节日的起义性质。

但在个体的孤独觉醒与起义集体的协同记忆之间，延伸出一系列具有我们“项目”潜力  
的社会形式。有些只是两个志同道合的灵魂之间的一次偶然相遇，他们可能会因短暂而神秘的  
相遇而相互扩大；其他的就像假期，还有一些像海盗乌托邦。似乎没有一个能持续很长时间  
——但那又如何？宗教和国家以它们的永恒而自豪——我们知道，这只是 jive……；他们的意  
思是死亡

我们不需要“革命”机构。“革命后”我们仍会继续漂泊，以逃避报复政治的即刻硬化，  
而是寻找过度的、奇怪的——这对我们来说已成为唯一可能的规范。如果我们现在加入或支持  
某些“革命”运动，如果他们“上台”，我们肯定是第一个“背叛”他们的人。毕竟，权力是给  
我们的——不是什么该死的先锋队。

在《临时自治区》(Autonopedia, NY, 1991) 中，讨论了“作为消失的权力意志”，强  
调了“自由”时刻的回避性和模糊性。在目前的系列文本中（最初在纽约 FM 电台上以 Radio  
Sermonettes 的形式呈现，并由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读书俱乐部以该标题出版），焦点转移到  
再现实践的想法上，从而组织的问题。对群体美学理论的尝试——而不是社会学或政治学——  
在这里被表达为自由精神的游戏，而不是制度的蓝图。作为媒介或异化机制的群体已被即刻主  
义群体所取代，致力于克服分离。这本书可以称为节日联谊的思想实验——它没有更高的野心。  
最重要的是，它并不假装知道“必须做什么”——准政委和大师的错觉。它不要门徒——它宁  
愿被烧死——献祭而不是模仿！事实上，它对“对话”几乎没有兴趣，宁愿吸引同谋者也不愿  
吸引读者。它喜欢说话，但只是因为说话是一种庆祝，而不是一种工作。

在这本书和沉默之间只有陶醉。

—Hakim Bey

(Vernal Equinox 1993)



# 即刻主义

# 1

所有的经验都是通过感官知觉、心理、语言等机制进行中介的，当然所有的艺术都包含一些对经验的进一步中介。

## 2

但是，中介是逐步进行的。有些体验（嗅觉、味觉、性快感等）比其他体验（读书、用望远镜看、听唱片）的中介作用要小。一些媒体，尤其是“现场”艺术，如舞蹈、戏剧、音乐或吟游表演，与电视、CD、虚拟现实等其他媒体相比，媒介较少。即使在通常被称为“媒体”的媒体中，根据他们所要求的想象参与的强度，一些媒体的中介程度更高，而另一些媒体的中介程度更低。到目前为止，印刷和广播对想象力的需求更多，电影更少，电视更少，VR 最少。

# 3

对于艺术来说，资本的介入总是预示着更深层次的中介。说艺术被商品化了，就是说已经发生了一种中介，或者说中间存在，这种中间性相当于分裂，这种分裂相当于“异化”。与在大都会现场“现场”播放的音乐或通过媒体（无论是 PBS、MTV 还是 Walkman）播放的音乐相比，朋友在家演奏的即兴音乐更“疏远”。事实上，可以提出这样的论点，即通过邮件免费或以磁带形式付费发行的音乐比在一些巨大的 We Are The World 奇观或拉斯维加斯夜总会播放的现场音乐更不被疏远，即使后者是现场播放的现场音乐观众（或至少看起来如此），而前者是由遥远甚至匿名听众消费的录制音乐。

# 4

高科技的趋势，以及晚期资本主义的趋势，都将艺术推向了越来越远的极端形式的中介。两者都拉大了艺术生产与消费的鸿沟，“异化”也相应增加。

# 5

随着艺术“主流”的消失，因此“前卫”的消失，人们注意到所有更高级和更激烈的艺术体验几乎立即被媒体恢复，因此被渲染为垃圾就像幽灵般的商品世界中的所有其他垃圾一样。“垃圾”这个词在 1970 年代的巴尔的摩被重新定义，可能很有趣——作为一种讽刺性的对一种无意中的民俗文化围绕并弥漫更多的“流行”感性的无意识区域——这反过来又部分地由景观产生。“垃圾”曾经是一个新鲜的概念，具有巨大的潜力。然而，到了现在，在后现代主义的废墟中，它终于开始发臭了。讽刺的轻浮终于变得令人厌恶。现在有可能变得严肃但不清醒吗？（注：新清醒当然只是新轻浮的反面。别致的新清教带有反应的污点，就像后现代主义哲学的讽刺和绝望导致反应一样。清洗社会与狂欢社，90 年代风靡的“十二步”后，只剩下绞刑架的第 13 步。讽刺可能已经变得无聊，但自残从来都不是深渊。打倒轻浮——打倒清醒地。）

从超现实主义到霹雳舞，一切精致而美丽的事物最终都成为 McDeath 广告的素材；15 分钟后，所有的魔法都被吸干了，艺术本身就像干蝗虫一样死了。媒体奇才，即使不是后现代主义者，也算不上什么，他们甚至开始以“垃圾”的活力为食，就像秃鹰在反刍和重新消耗同样的腐肉一样，以一种淫秽的自我参照狂喜。哪条路到出口？

# 6

真正的艺术是游戏，而游戏是所有体验中最直接的体验之一。不能指望那些培养了游戏乐趣的人仅仅为了提出政治观点而放弃它（如“艺术罢工”或“艺术的“压制而不实现”等）。艺术将继续，在有点像呼吸、进食或他妈的会继续的感觉。

# 7

然而，我们对艺术的极端异化感到反感，尤其是在“媒体”、商业出版和画廊、录音“行业”等方面。我们有时甚至担心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这些写作、绘画或音乐等艺术让我们陷入了一种令人讨厌的抽象之中，一种从直接经验中脱离出来的东西。我们错过了游戏的直接性（我们最初在做艺术方面的动力）；我们想念嗅觉、味觉、触觉和身体运动的感觉。



## 8

电脑、视频、收音机、印刷机、合成器、传真机、录音机、复印机——这些东西是很好的玩具，但令人上瘾。最后，我们意识到我们无法“伸出手去触摸”肉身存在的人。这些媒体可能对我们的艺术有用——但它们不能占有我们，也不能介于我们之间、调解我们或将我们与我们的动物/有生命的自我分开。我们想控制我们的媒体，而不是被他们控制。我们应该记住某种通灵武术，它强调身体本身是所有媒介中中介最少的。

# 9

因此，作为无意放弃在我们选择的媒体中活动的艺术家和“文化工作者”，我们仍然要求自己具有一种极端的即刻性意识，以及立即掌握将这种意识作为游戏来实现的一些直接手段。（即刻（无需调解，无需中介）。

# 10

充分意识到今天所写的任何艺术“宣言”都只能散发出它试图反对的同样苦涩的讽刺味道，但我们仍然毫不犹豫地（不加思索地）宣布成立了“运动”，即即刻主义。我们可以随意这样做，因为我们打算秘密实践即刻主义，以避免任何对调解的污染。在公开场合，我们将继续我们在出版、广播、印刷、音乐等方面的工作，但在私下，我们将创造一些其他的東西，一些可以自由分享但绝不被动消费的东西，一些可以公开讨论但永远不会被代理人理解的东西异化，一种没有商业潜力但比价格更有价值的东西，一种神秘但完全融入我们日常生活的东西。

# 11

即刻主义不是审美程序意义上的运动。这取决于情况，而不是风格或内容、信息或学校。它可以采取任何形式的创造性游戏，可以由两个或更多人，由他们自己，面对面和一起表演。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就像一场游戏，因此可能适用某些“规则”。

# 12

所有观众也必须是表演者。所有费用均分摊，游戏产生的所有产品也只能由参与者共享（他们可以保留或作为礼物赠送，但不得出售）。最好的游戏很少或根本不使用明显的中介形式，如摄影、录音、印刷等，但会倾向于涉及身体存在、直接交流和感官的即刻技术。

# 13

即刻主义的一个明显矩阵是政党。因此，一顿美餐可能是一个即刻主义的艺术项目，特别是如果在场的每个人都做饭和吃饭。古代中日两国在秋雾缭绕的日子里，会举行香氛派对，每位客人都会带上自制的香或香水。在联诗派对上，如果对联出现错误，将受到一杯酒的惩罚。绡缝蜜蜂、活生生的画面、精美的身体、欢乐的仪式，如傅立叶的“博物馆狂欢”（色情服装、姿势和短剧）、现场音乐和舞蹈——过去可以被洗劫成合适的形式，而想象力将提供更多。

# 14

70年代的邮件艺术和80年代的杂志场景试图超越作为商品的艺术的中介，可以被认为是即刻主义的祖先。然而，他们保留了邮政通信和静电复印的中介结构，因此未能克服玩家的孤立感，他们几乎完全脱离了联系。我们希望将这些早期运动的动机和发现带入一种消除所有中介和异化的艺术中的合乎逻辑的结论，至少在人类条件允许的范围内。

# 15

而且，即刻主义并没有因为它避免了市场的宣传而注定了世界的无能为力。“诗性恐怖主义”和“艺术破坏”是即刻主义的非常合乎逻辑的表现。



# 16

最后，我们期待即刻主义的实践将在我们体内释放出巨大的被遗忘的力量宝库，这不仅会通过无中介游戏的秘密实现来改变我们的生活，而且会不可避免地涌现、爆发和渗透到我们的其他艺术中。更多的公共和媒介艺术。

我们希望这两者会越来越近，最终也许会合二为一。

堂/帮

官吏从法律中汲取权力；来自秘密结社的人。（中国谚语）

去年冬天，我读了一本关于中国“堂”的书（*Primitive Revolutionaries of China: A Study of Secret Societies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Fei-Ling Davis; Honolulu, 1971-77）：——也许是第一本由“英国特勤局特工！”——（事实上，她是一位英年早逝的中国社会主义者——这是她唯一的一本书）——我第一次意识到为什么我总是被唐人吸引：不仅仅是为了浪漫主义，优雅颓废的中国风装饰，但也体现在形式、结构和事物的本质上。

一段时间后，在 *Homocore* 杂志对 William Burroughs 的一次精彩采访中，我发现他也对堂所着迷，并建议这种形式是酷儿组织的完美模式，尤其是在当今这个狗屎道德主义和歇斯底里的时代。我同意并将建议扩展到所有边缘群体，尤其是那些享乐涉及非法主义（*potheads*、性异端、叛乱分子）或极端古怪（裸体主义者、异教徒、后前卫艺术家等）的群体。

堂，也许可以被定义为一个为具有共同利益的人而设的互惠互利的社会，这是非法的或危险的边缘——因此，这是必要的保密。许多中国堂围绕着走私和逃税，或对某些行业的秘密自我控制（反对国家控制），或起义的政治或宗教目的（例如推翻满族——几个堂在 1911 年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革命）。

最近我和 bolo' bolo (*Semiotext(e) Foreign Agents Series*) 的作者“P.M.”谈论了堂。我认为秘密社团再次成为寻求自治和个人实现的团体的有效可能性。他不同意，但不是（如我所料）因为保密的“精英”内涵。他认为这种组织形式最适合已经紧密结合的具有强大经济、种族/地区或宗教联系的群体——在今天的边缘场景中不存在（或仅存在于萌芽状态）的条件。相反，他提议建立多功能邻里中心，费用由各种特殊利益团体和小型企业（手艺人、咖啡馆、表演空间等）分担。如此大的中心将需要官方地位（国家承认），但显然会成为各种非官方活动的焦点——黑市、“抗议”或暴动行动的临时组织、不受控制的“休闲”和不受监控的欢乐等等。

为了回应“P.M.”的批评，我并没有放弃而是修改了我对现代童可能是什么的概念。传统通的高度等级结构显然行不通，尽管某些形式可以保存和使用，就像我们的“自由宗教”（或“怪异”宗教，“笑话”宗教，无政府新异教等）。无等级的组织对我们很有吸引力，但仪式、熏香、令人愉快的神秘命令的夸夸其谈也很有吸引力——你可以称之为“堂的美学”——那么我们为什么不也吃蛋糕呢？——（尤其是如果这是摩洛哥 *majoun* 或 *baba au absinthe*——有点被禁止的东西！）。除其他外，堂应该是一件艺术品。

严格的传统保密规则也需要修改。如今，任何能避开公众白痴目光的东西实际上已经是秘密了。大多数现代人似乎无法相信他们从未在电视上看到的东西的真实性——因此，逃避被电视化已经是准隐形的。此外，通过媒体的中介所看到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变得不真实，并失去了它的力量（我不会费心为这个论点辩护，只是简单地让读者参考从尼采到本雅明到巴塔耶到巴特的一系列思路从福柯到鲍德里亚）。相比之下，也许那些看不见的东西保留了它的真实性，它植根于日常生活，因此也保留了奇妙的可能性。

所以现代堂不能是精英——但没有理由不能挑剔。许多非威权组织已经在公开会员制的可疑原则上失败了，这经常导致混蛋、雅虎、破坏者、抱怨的神经症和警察占优势。如果一个堂是围绕一个特殊利益（尤其是非法的或有风险的或边缘的利益）组织起来的，它当然有权根据“亲和群体”原则组成自己。如果保密意味着（a）避免公开和（b）审查可能的成员，那么“秘密社团”几乎不能被指责违反无政府主义原则。事实上，这些社会在反独裁运动中有着悠久而光荣的历史，从蒲鲁东将神圣维姆重新激活为一种“人民正义”的梦想，到巴枯宁的各种计划，再到杜鲁蒂的“流浪者”。我们不应该让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说服我们这样的权宜之计是“原始的”，因此被“历史”抛在了后面。“历史”的绝对性充其量是一个可疑的命题。我们对回归原始不感兴趣，而是对原始的回归感兴趣，因为原始是“被压抑的”。

在过去，秘密社团会出现在国家禁止的时间和空间，即法律规定人们被隔离的地方和时间。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通常不是通过法律隔离，而是通过中介与调节被疏远（见第1部分，“即刻主义”）。秘密因此成为对中介调节的回避，而欢乐则从“秘密社会”的次要目的变为主要目的。仅仅面对面地见面就已经是一种对抗那些通过孤立、孤独、媒体的恍惚来压迫我们的力量的行动。

在一个强制将工作与休闲分开的社会中，我们都经历过“空闲时间”的琐碎化，即既不是工作也不是休闲的时间。（“假期”曾经意味着“空闲”时间——现在它表示由休闲行业组织和填充的时间。）秘密社会中欢乐的“秘密”目的然后变成了自由的自我构建和自我增值时间。大多数派对只专注于喧闹的音乐和过多的酒水，不是因为我们喜欢它们，而是因为工作帝国让我们感到空虚的时间就是浪费时间。举办派对，比如制作被子或一起唱牧歌的想法似乎已经过时了。但现代堂会发现从商品世界中夺回空闲时间并将其投入到共享创作、玩耍中既必要又令人愉快。

我知道已经有几个按照这些思路组织的社团，但我当然不会通过在印刷品上讨论它们来破坏他们的秘密。有些人不需要十五秒就可以在晚报上验证他们的存在。当然，边缘的新闻和广播（可能是唯一会出现这篇讲道的媒体）实际上是不可见的——当然对于控制的注视来说仍然非常不透明。然而，事情的原则是：应该尊重秘密。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知道一切！20世纪最缺乏——也是最需要的——是机智。我们希望用“达达认识论”（费耶阿本德）代替民主认识论。要么你在公共汽车上，要么你不在公共汽车上。

有人会称这是一种精英态度，但它不是——至少不是 C. Wright Mills 所理解的：也就是说，一小群人为了自己的扩张而对非内部人员行使权力。即刻主义不关心权力关系——它既不想统治，也不想被统治。因此，当代堂不乐于将制度堕落为阴谋。它为了自己的互惠目的而需要权力。它是个人的自由联合，他们选择彼此作为群体慷慨的主体，它的“扩张性”（使用苏菲派术语）。如果这相当于某种“精英主义”，那就是吧。

如果即刻主义从一群朋友开始，不仅要克服孤立，还要改善彼此的生活，很快它就会想要采取更复杂的形式：——相互自我选择的盟友的核心，工作（玩耍）以占用越来越多的时间

和所有中介结构和控制之外的空间。然后它会想要成为这样一个自治团体的水平网络——然后是“趋势”——然后是“运动”——然后是“临时自治区域”的动态网络。最终它将努力成为新社会的内核，在旧社会的腐朽外壳中诞生。出于所有这些目的，秘密社团承诺提供一个有用的保护秘密框架——一件隐身斗篷，只有在与调解巴比伦的最后一场降雪的情况下才能脱下……

为堂的战斗做准备！

# 即刻主义对抗资本主义

许多贵物挡在我们与即刻主义目标的实现之间。例如，我们自己根深蒂固的无意识疏离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一种美德，尤其是与被冒充为“社区”的加密专制主义大爷或各种高档版本的“休闲”形成鲜明对比时。当唯一明显的对比是地中海俱乐部商品社会主义或受害者邪教的友善受虐狂时，将粗暴隐士的纨绔黑色子弟视为某种英雄的个人主义不是很自然吗？当 doomer 和变得 cool，自然比被拯救和舒适更能吸引高贵的灵魂。

即刻主义意味着通过提供友谊矩阵来增强个人，而不是通过牺牲他们的“自我”来进行集体思考、左派自我否定或新时代的克隆价值观来贬低他们。必须克服的不是个性本身，而是对痛苦孤独的沉迷，这是 20 世纪意识的特征（这大体上不过是 19 世纪的重演）。

然而，比任何（可能被称为）“消极自私”的内在怪物更危险的是太晚期资本主义的外在、非常真实和完全客观的贵物。马克思主义者（R.I.P.）有他们自己的版本，但在这里我们不关心对劳动价值或阶级结构的抽象/辩证分析（尽管这些可能仍然需要分析，自从“死亡”以来更是如此或共产主义的“消失”）。相反，我们想指出任何即刻主义项目面临的具体战术危险。

1. 资本主义只支持某些类型的群体，例如核心家庭，或“我在工作中认识的人”，因为这些群体已经自我疏远并陷入工作/消费/死亡结构。其他类型的团体可能会被允许，但会缺乏社会结构的所有支持，从而发现自己面临着以“倒霉”为幌子出现的怪诞挑战和困难。

任何即刻主义项目的第一个也是最无辜的障碍将是其每个成员面临的“忙碌”或“需要谋生”。然而，这里并没有真正的纯真——只有我们对资本主义本身的组织方式的深刻无知，以防止所有真正的欢乐。

一群朋友刚开始设想只有通过团结与合作才能实现的近期目标，突然间，他们中的一个人将在辛辛那提（美国俄亥俄州西南部城市）获得一份“好”工作或在台湾教英语——否则就不得不搬回加利福尼亚照顾对于一个垂死的父母——否则他们将失去他们已经拥有的“好”工作，并陷入痛苦的状态，从而妨碍他们享受团队的项目或目标（即他们会变得“沮丧”）。在最平凡的层面上，由于每个人都“忙”，小组将无法就一周中的哪一天开会达成一致。但这并不平凡。这是纯粹的宇宙邪恶。我们对“压迫”和“不公正的法律”感到愤愤不平，而事实上这些抽象概念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几乎没有影响——而真正让我们痛苦的事情却被忽视了，被写成“忙碌”或“分心”或甚至是现实本身的本质（“好吧，我不能没有工作”）。

是的，也许这是真的，没有工作我们就无法“生活”，尽管我希望我们已经长大，能够了解生活与积累一堆该死的小玩意儿之间的区别。还我们必须不断提醒自己（因为我们的文化不会为我们做这件事），这个被称为工作的怪物仍然是我们叛逆愤怒的精确目标，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最残酷的现实（我们还必须学会在工作伪装成“休闲”时认识它）。

对即刻主义项目“太忙”就是错过即刻主义的本质。努力在每个星期一晚上（或其他什么）聚在一起，不顾忙碌、家庭或愚蠢派对的邀请——这种斗争本身就是即刻主义。成功地与一个不是你的配偶和孩子，或者“我的工作中的人”，或者你的 12 步计划的群体进行面对面的面对面交流——你几乎已经实现了即刻主义所渴望的一切。一个实际的项目几乎会从这种对异

化无聊的社会规范的成功打击中自然而然地产生。当然，从表面上看，该项目似乎是该小组的目的，是其走到一起的动机——但实际上恰恰相反。当我们坚持认为面对面会晤已经是“革命”时，我们并不是在开玩笑或沉迷于夸张。实现它，创意部分自然而然；就像“天国”一样，它会加给你。当然，这将是非常困难的——如果在某些拉丁区或农村公社很容易拥有它，为什么我们会在过去十年中尝试构建我们的“邮件中的波西米亚”？告诉你用电话“伸出援手”或“待在那儿！”的混蛋资本主义败类。（在哪里？独自在该死的电视机前??）——这些爱狡猾的傻瓜正试图把你变成人类灵魂的死亡机器中的一个皱巴巴的、流血的可怜的残废小齿轮（我们不要有任何神学上的狡辩关于我们所说的“灵魂”!）。与他们战斗——与朋友会面，不是为了消费或生产，而是为了享受友谊——你将（至少暂时）战胜当今欧美社会最有害的阴谋——将你变成活尸的阴谋被假肢和稀缺的恐惧所激发——把你变成一个萦绕在你自己大脑中的幽灵。这可不是小事！这是一个失败或胜利的问题！

2. 如果忙碌与分裂是直接主义的第一个潜在失败，我们不能说它的胜利应该等同于“成功”。对我们项目的第二个主要威胁可以很简单地描述为项目本身的悲惨成功。假设我们已经克服了身体上的疏离感，并且已经真正认识、开发了我们的项目，并创造了一些东西（被子、宴会、戏剧、生态破坏等）。除非我们绝对保密——这可能是不可能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构成某种有毒的自私——其他人会听到它（其他来自地狱的人，套用存在主义者的话）——在这些人中，有些人是太晚期资本主义的代理人（有意识或无意识，没关系）。景观——或自1968年以来取代它的任何东西——首先是空的。它通过不断地像莫洛克一样吞噬每个人的创造力和想法来为自己加油。它比吸血鬼或警察更渴望你的“激进主观性”。它需要你的创造力，甚至比你自己想要的还要多。除非你想要它，否则它就会死去，而且只有当它似乎为你提供你梦寐以求的欲望时，你才会渴望它，独自在你孤独的天才中，伪装并作为商品卖给你。啊，物体的形而上学的诡计！（或大意是这样的话，马克思引用本雅明的话）。

突然间，你会觉得（好像恶魔在你耳边低语）你创造的即兴艺术是如此的好，如此新鲜，如此原始，如此强大，与“市场”上的所有垃圾相比——如此纯粹——你可以把它冲淡并卖掉它，然后以此为生，这样你们就可以放弃工作，在乡下买一个农场，然后永远一起做艺术。也许是真的。你可以……毕竟，你是天才。但最好飞到夏威夷，把自己扔进活火山。当然，你可以成功；你甚至可以在《晚间新闻》或PBS纪录片中看到你的生活。确实是的。

3. 但这是最后一个主要怪物介入的地方，撞穿客厅的墙壁，扼杀你（如果成功本身还没有“宠坏”你，那就是）。

因为为了成功，你必须首先被“看到”。如果你被看到，你会被认为是错误的、非法的、不道德的——与众不同。奇观的主要创造力来源都在监狱里。如果你不是核心家庭、导游或共和党，那你为什么每周一晚上开会？做毒品？非法性行为？偷税漏税？撒旦教？

当然，你的即刻主义者团体从事非法活动的可能性很大——因为几乎所有令人愉快的事情实际上都是非法的。巴比伦讨厌任何人真正享受生活，而不是徒劳地花钱买享受的假象。消



散、暴饮、暴食——这些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强制性的。如果您不浪费自己在商品的空虚上，那么您显然是异类，并且根据定义必须违反某些法律。在这个社会里，真正的快乐比抢劫银行更危险。至少银行劫匪和马萨一样尊重马萨的钱。但是你们，你们这些变态，显然应该在火刑柱上被烧死——农民们拿着火把来了，他们渴望在没有被问到的情况下为国家的吩咐做事。现在你是怪物，你的即刻主义小哥特式城堡被火焰吞没。突然，警察从木制品中蜂拥而出。你的文件整齐吗？你有生存许可吗？

即刻主义是一场野餐——但这并不容易。即刻主义是自由人类可以想象的最自然的道路，因此是资本眼中最不自然的可憎之物。即刻主义将取得胜利，但只有以权力的自我组织、秘密和起义为代价。即刻主义是我们的喜悦，即刻主义是危险的。

# 内卷

到目前为止，我们将直接主义视为一种美学运动，而不是一种政治运动——但如果“个人是政治的”，那么美学当然必须被更多地考虑。“为艺术而艺术”根本不能说真的存在，除非它被认为是暗示艺术本身作为政治力量发挥作用，即能够表达甚至改变世界而不仅仅是描述世界的力量。

事实上，艺术总是在寻求这样的力量，无论艺术家是对事实保持无意识并相信“纯粹”的美学，还是对事实过于清醒以至于除了煽动道具什么都没有。正如尼采所指出的，意识本身在生活中的作用不如权力那么重要。没有什么比“艺术世界”（SoHo、57th St. 等）的持续存在更能证明这一点的了，它仍然相信政治艺术和审美艺术的不同领域。这种意识的失败让这个“世界”可以奢侈地生产具有公开政治内容的艺术（以满足他们的自由主义客户）以及没有这种内容的艺术，这只是表达了资产阶级败类和银行家为投资而购买它的权力投资组合。

如果艺术不具备并运用这种力量，它就不值得去做，也没有人会去做。为艺术而文学艺术只会产生无能和虚无。甚至那些发明了 *l'art pour l'art* 的世纪末颓废者也在政治上使用它：——作为反对资产阶级“功利”、“道德”等价值观的武器。艺术可以消除政治意义的想法现在只吸引那些希望以“它只是艺术”为由为“色情”或其他被禁止的审美游戏开脱的自由派白痴，因此无法改变任何事情。（我比杰西赫尔姆斯更讨厌这些混蛋；至少他仍然相信艺术有力量！）

即使一种没有政治内容的艺术可以——暂时——被承认存在（尽管这仍然是非常成问题的），那么艺术的政治意义仍然可以从其生产和消费的手段中寻找。第 57 街的艺术无论其内容看起来多么激进，它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正如沃霍尔通过绘画切格瓦拉所证明的那样；事实上，瓦莱丽·索拉尼斯（Valerie Solanis）通过射杀沃霍尔（甚至可能比切，即红色法西斯主义的鲁道夫·瓦伦蒂诺）更激进得多。

事实上，我们并不十分关心即刻主义艺术的内容。对我们来说，即刻主义比“运动”更像是游戏；因此，该游戏可能会导致布莱希特式的说教主义或诗意的恐怖主义，但它也可能完全不留下任何内容（例如在宴会中），或者没有明显的政治信息（例如被子）。直接主义的激进品质更体现在其生产和消费方式上。

也就是说，它是由一群朋友单独为自己或为更大的朋友圈制作的；它不是为销售而生产的，也不是出售的，也不允许（理想情况下）以任何方式脱离其生产者的控制。如果它是为了圈外消费，那么它必须以一种不受合作和商品化的方式制造。例如，如果我们的一条被子从我们身边逃走并最终作为“艺术品”卖给了一些资本家或博物馆，我们应该认为这是一场灾难。被子必须留在我们手中，或者交给那些会欣赏并保留它们的人。至于我们的宣传道具，它必须以它的形式抵制商品化；——我们不希望我们的海报在 20 年后像米雅科夫斯基（或布莱希特）那样作为“艺术品”出售。最好的即刻主义煽动者根本不会留下任何痕迹，除了那些被它改变的人的灵魂。

让我们在这里重复一遍，参与即刻主义并不排除组成该群体的个人以其他方式生产/消费艺术。我们不是理论家，这不是琼斯敦。这是一场比赛，而不是一场运动；它有游戏规则，但没有法律。如果每个人都是艺术家，即刻主义会喜欢它，但我们的目标不是大规模转换。游戏的回报在于它能够摆脱商业艺术世界（包括文学等）的悖论和矛盾，在商业艺术世界中，所有解放的姿态似乎最终都只是代表，因此是对自己的背叛。我们为艺术提供了机会，因为它只能在我们面前存在。我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仍然会写小说或画画，要么是为了“谋生”，要么是为了寻求从疗养中拯救这些形式的方法。但是直接主义回避了这两个问题。因此，它像所有游戏一样是“特权”。

但我们不能仅仅因为这个原因把它称为内卷的、自发的、封闭的、内向的、精英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在即刻主义中，艺术是以某种方式生产和消费的，而这种作案方式在非常具体的意义上已经是“政治的”。然而，为了把握这个意义，我们必须首先更深入地探索“内卷(involution)”。

说社会不再表达共识（无论是反动的还是解放的），而是为社会表达了错误的共识，这已成为不言而喻；让我们把这种错误的共识称为“整体”。整体是通过调解和异化产生的，它试图为整体吸收或吸收所有的创造力。米亚科夫斯基意识到这一点后自杀了。也许我们是由更严厉的东西组成的，也许不是。但为了争论，让我们假设自杀不是一个“解决方案”。

整体性通过仅提供虚幻的社会表达模式来孤立个人并使他们无能为力，这些模式似乎承诺解放或自我实现，但实际上以产生更多的调解和异化而告终。这种情结可以在“商品拜物教”的层面上清晰地看待，其中最叛逆或最前卫的艺术形式可以变成 PBS 或 MTV 的素材或牛仔裤或香水的广告。

然而，在更微妙的层面上，整体可以通过重新情境化和重新呈现任何力量来吸收和重新引导任何力量。例如，一幅画的解放力量可以被中和甚至吸收，只需将它放在画廊或博物馆的背景下，它就会自动成为解放力量的纯粹代表。一个疯子或罪犯的叛乱姿态不仅可以通过关押肇事者来否定，而且更多的是通过允许表现出这种姿态——由精神病医生或第 5 频道的一些无脑 Kopshow 或甚至通过咖啡桌关于艺术的书布鲁特。这被称为“景观的康复”；然而，通过模拟它以前试图恢复的东西，整体可以走得更远。也就是说，艺术家和疯子不再是必要的，即使是本雅明所说的挪用或“机械复制”的来源。模拟无法重现本雅明甚至允许商品垃圾的“光环”的微弱反射，它的“乌托邦痕迹”。模拟实际上不能复制或产生任何东西，除了荒凉和痛苦。但由于整体在我们的苦难中茁壮成长，所以模拟非常适合它的目的。

所有这些影响都可以在通常被称为“媒体”的领域中最明显、最粗略地追踪（尽管我们认为调解的范围比广播这个词所能描述或表明的要广泛得多）。媒体在最近的任天堂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事实上媒体与那场战争的一对一认同——提供了一个完美且堪称典范的场景。在美国，数以百万计的人至少拥有足够的“启蒙”来谴责白宫那个杀人不眨眼的间谍对道德的可怕模仿。然而，媒体制造（即模拟）了几乎不存在或可能存在反对布什战争的印象；那（引

用布什的话)“没有和平运动”。事实上,没有和平运动——只有数以百万计的和平愿望被总体否定的人像秘鲁敢死队的受害者一样被消灭、“消失”;人们因电视、新闻管理、信息娱乐和纯粹的虚假信息的残酷疏远而彼此分离;人们感到被孤立、疏离、怪异、奇怪、错误,最终不存在;没有声音的人;没有权力的人。

这种分裂的过程在我们的社会中已经接近普遍完成,至少在社会话语领域是这样。每个人都参与了对媒体的壮观模拟的“内卷关系”。也就是说,我们与媒体的“关系”本质上是空洞和虚幻的,因此,即使我们似乎伸手去感知媒体中的现实,我们实际上也只是被驱赶回自己,疏远、孤立和无能为力。美国到处都是这样的人,他们觉得无论他们说什么或做什么都不会有所作为;没有人在听;没有人可以听。这种感觉是媒体的胜利。“他们”说,你听——因此在孤独、分心、抑郁和精神死亡的螺旋中转向自身。

这个过程不仅影响个人,还影响在核家庭、学校、教堂、工作、军队、政党等共识矩阵之外仍然存在的群体。每个艺术家或和平活动家群体或任何其他人也被认为是无法与其他团体联系。每个“生活方式”群体都购买了与其他此类消费者群体的竞争和敌意的模拟。每个阶级和种族都确信其与所有其他阶级和种族的的存在不可分割的异化(如富人和名人的生活方式)。

“网络(networking)”的概念最初是一种革命性的策略,通过在个人和群体之间建立横向联系(不受权威影响)来绕过和克服整体性。在1980年代,我们发现网络也可以通过电话、计算机、邮局等方式进行调解,事实上也必须进行调解,因此我们在与异化的斗争中注定要失败。通信技术可能仍会在这场斗争中提供有用的工具,但现在很明显,CommTech本身并不是一个目标。事实上,我们对个人电脑和手机等看似“民主”的技术的不信任随着每次革命性的未能控制生产资料而增加。坦率地说,我们不希望被迫下定决心,是否有任何新技术将或必须是解放性或反解放性的。“革命之后”这些问题将在“欲望政治”的背景下得到解答。然而,就目前而言,我们已经发现(不是发明)即刻主义作为一种直接生产和展示创造性、解放性和滑稽能量的手段,在没有任何机械或异化结构的调解下进行……或者至少我们是这样的希望。

换句话说,无论是否可以使用任何给定的技术或调解形式来克服整体性,我们已经决定玩一个不使用此类技术的游戏,因此不需要质疑它——至少,不在境内的游戏。我们将我们的挑战,我们的问题保留给整体,而不是任何它试图分散我们注意力的“问题”。

这让我们回到了即刻主义的“政治形式”。面对面、身体对身体、呼吸对呼吸(字面意思是一个阴谋)——即刻主义的游戏根本无法在虚假共识的任何层面上进行。它不代表“日常生活”——它不能是日常生活之外的东西,尽管它把自己定位为穿透奇妙,为美妙照亮真实。就像一个秘密社团,它的网络必须很慢(比通信技术、媒体和战争的“纯速度”慢得多),而且它必须是有形的而不是抽象的、没有肉体的、由机器或权威或模拟中介的。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即刻主义是野餐(一种欢乐),但并不容易——它对自由精神来说是最自然的,但它是危险的。内容与它无关。**即刻主义的纯粹存在已经是一种叛乱。**

**想象力**

戏剧是有时间的——如果人们的想象力变得虚弱，它就会产生在舞台上呈现它的传奇的倾向：它现在可以忍受这些粗暴的想象力替代品。但是史诗狂想曲所属的那些时代，戏剧和伪装成英雄的演员是想象力的障碍，而不是赋予它翅膀的手段：太近了，太明确了，太沉重了，梦想和鸟儿-飞翔太少了。——尼采

当然，在这里出现的吟游诗人与萨满（“……梦想与飞鸟”）仅相距一步，也必须被称为一种媒介或桥梁，介于“一个民族”和它的想象之间。（注意：我们有时会在 Wm. Blake 的意义上使用“imagination”这个词，有时在 Gaston Bachelard 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而不选择“精神”或“审美”的决定，也不会求助于形而上学。）（“翻译”、“隐喻”）但不是原文。翻译就是背叛。即使是狂想曲家也为想象力提供了一点毒药。

然而，人类学（Ethnography）使我们能够断言这样的社会的可能性，在这个社会中，萨满不是想象力的专家，但每个人都是一特殊的萨满。在这些社会中，所有成员（精神障碍者除外）都为自己和人民充当巫师和吟游诗人。例如：大平原的某些美洲印第安人部落在其历史上很晚才发展出所有狩猎/采集社会中最复杂的社会（可能部分归功于枪和马，以及从欧洲文化中采用的技术）。每个人只有通过 Vision Quest 及其对部落的艺术表演，才能获得完整的身份和“人民”的正式成员资格。因此，每个人都成为与集体分享这种个性的“史诗狂想曲”。

俾格米人（Pygmies）是最“原始”的文化之一，既不生产也不消费他们的音乐，而是集体成为“森林之声”。在规模的另一端，在复杂的农业社会中，例如处于 20 世纪边缘的巴厘岛，“每个人都是艺术家”（1980 年，一位爪哇（Javanese）神秘主义者告诉我，“每个人都必须是艺术家！”）。

即刻主义的目标位于这三点（俾格米人、平原印第安人、巴厘岛人）大致描述的轨迹上的某个地方，这三点都与“民主萨满教”的人类学概念有关。创造性行为本身是想象力的内在结果，当它们由每个人为每个人执行时，它们不会被中介和异化（在我们一直使用的意义上）——当它们被生产但不是复制——当它们共享但不迷恋。当然，这些行为是通过某种调解实现的——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所有的行为一样——但它们还没有成为某些专家/牧师/制片人之间的极端疏远力量，一方面是一些倒霉的“门外汉”或消费者。

因此，不同的媒体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中介——也许它们甚至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排名。在这里，一切都依赖于互惠，依赖于或多或少平等的交换，即所谓的“想象量”。对于为部落调解愿景的史诗狂想曲家来说，大量的工作——或积极的梦想——仍有待听众完成。他们必须富有想象力地参与到讲述/聆听的行为中，并且必须从他们自己的创造力库中调用图像来完成狂想曲者的行为。

在 Voodoo & Santeria 的“仪式剧场”中，在场的每个人都必须通过想象 loa 或 orisha（想象原型）来参与，并通过召唤它们（用“标志性”圣歌和节奏）显现。任何在场的人都可能成为这些 santos 之一的“马”或媒介，其言行对所有庆祝者来说都是精神存在的方面（即被附身的人不代表而是呈现）。这种结构也是印度尼西亚仪式剧院的基础，可以被视为“民主萨

满教”创造性生产的典范。为了构建我们对所有媒体的想象规模，我们可以先将这个“巫毒剧院”与尼采描述的18世纪欧洲剧院进行比较。

在后者中，最初的愿景（或“精神”）实际上并不存在。演员只是重新呈现——他们是“伪装的”。没想到剧团任何成员或观众会突然被剧作家的形象所迷住（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启发”）。**演员是表现的内行或专家，而观众是“外行”，各种图像被传递给他们。观众是被动的，为观众做的太多了，他们确实被锁在黑暗和沉默中，被他们为这种替代体验所支付的钱而动弹不得。**

意识到这一点的阿尔托试图复兴仪式巫毒戏剧（被亚里士多德从西方文化中驱逐）——但他在亚里士多德戏剧的结构（演员/观众）内部进行了尝试；他试图从内到外摧毁或变异它。他失败并发疯了，引发了一系列实验，最终导致生活剧院对演员/观众屏障的攻击，这是一种试图迫使观众“参与”仪式的字面攻击。这些实验产生了一些伟大的戏剧，但都未能达到其最深层的目的。没有人能够克服尼采和阿尔托所批评的疏离感。

即便如此，戏剧在想象尺度上仍比电影等其他及后来的媒体占据更高的位置。至少在剧院中，演员和观众在同一空间中同时出现，从而创造了彼得布鲁克所说的演员和观众之间注意力和同感的“无形金链”——众所周知的“魔法”或剧院。然而，有了电影，这条链条就被打破了。现在观众独自坐在黑暗中无所事事，而缺席的演员则由巨大的偶像代表。不管“放映”多少次，总是一样的，被机械地复制，没有任何“光环”，电影实际上是禁止观众“参与”的——电影不需要观众的想象。当然，电影确实需要观众的钱，而钱毕竟是一种具象化的想象残渣。

爱因斯坦会指出，蒙太奇在电影中建立了一种辩证的张力，吸引了观众的思想——智力和想象力——迪斯尼可能会补充说（如果他有意识形态的话）动画会增加这种效果，因为动画实际上完全是由剪辑。电影也有它的“魔力”。的确。但从结构的角度来看，我们已经远离巫毒戏剧和民主萨满教——我们已经危险地接近想象的商品化，以及商品关系的异化。我们几乎放弃了飞行的力量，甚至是梦想飞行的力量。

书籍？书籍作为媒介只传递文字——没有声音、景象、气味或感觉，所有这些都留给读者的想象。好吧……但是书籍没有什么“民主”的。作者/出版商生产，你消费。书籍也许会吸引“富有想象力”的人，但他们所有的想象力活动实际上都相当于被动，独自一人拿着一本书，让别人讲故事。书籍的魔力有些阴险，就像博尔赫斯的图书馆一样。教会关于该死书的清单的想法可能还远远不够——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书都是该死的。文本的爱欲是一种变态——尽管如此，我们沉迷其中，并且不急于踢。

至于收音机，它显然是一种缺席的媒介——就像书本一样，因为书让你独自在光明中，收音机让你独自在黑暗中。广告商为广播节目付费，而不是在书本上（或不是很多），这一事实揭示了“听众”更加被动的被动性。尽管如此，广播给听众留下的“作品”比电视给观众留下的要多得多。无线电的魔力：人们可以用它来收听太阳黑子辐射、木星风暴、彗星的呼啸声。



收音机是老式的；这就是它的诱惑力。广播传教士说：“兄弟姐妹们，把你们的 haaaadns 放在广播上，感受神的话语的力量！”巫毒电台？

（注：可以对录制的音乐进行类似的分析：即它是异化但尚未异化。唱片取代了家庭业余音乐制作。录制的音乐太普遍，太容易——不存在的并不罕见。然而，对于深夜在遥远的广播电台播放的沙哑的老式 78 年代，有很多话要说——一道闪光，似乎在所有层面的调解中引发火花，并实现了一种自相矛盾的存在。）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相信“广播是好的——电视是坏的！”这个原本可疑的命题。因为电视占据了媒体想象规模的最底层。不，那不是真的。“虚拟现实”甚至更低。但电视是情境主义者在提到“景观”时所指的媒介。电视是即刻主义最想克服的媒介。书籍、戏剧、电影和广播都保留了本雅明所说的“乌托邦痕迹”（至少在潜力上）——反对异化冲动的最后一丝痕迹，想象中最后的芬芳。然而，电视一开始就抹去了那条痕迹。难怪最早的视频广播者是纳粹。电视之于想象就像病毒之于 DNA。结束。除了电视之外，只有无空间/无时间的下媒体领域、通信技术的即时性和狂喜、纯粹的速度、将意识下载到机器、程序中——换句话说，地狱。

这是否意味着即刻主义要“废除电视”？不，当然不是——因为即刻主义想要成为一场游戏，而不是一场政治运动，当然也不是一场有权废除任何媒介的革命。即刻主义的目标必须是肯定的，而不是否定的。我们觉得没有必要消除任何“生产资料”（甚至是再生产），因为它们总有一天会落入“一个民族”的手中。

我们通过询问每个媒体涉及多少想象力以及多少互惠来分析媒体，这仅仅是为了为我们自己实施解决尼采概述的问题的最有效方法，而阿尔托则感到如此痛苦，即异化问题。对于这项任务，我们需要一个粗略的媒体层次结构，一种衡量它们对我们使用潜力的方法。粗略地说，想象力被释放和分享的越多，媒介就越有用。

也许我们不能再召唤灵魂附身，或者像萨满巫师那样访问他们的领域。也许不存在这样的精神，或者也许我们太“文明”而无法识别它们。或者也许不是。然而，创造性的想象力对我们来说仍然是一种现实——我们必须探索它，即使是在我们得救的徒劳希望中。

**Lascaux**

每一种文化（或者无论如何每一种主要的城市/农业文化）都珍视两个显然相互矛盾的神话：退化的神话和进步的神话。René Guénon 和新传统主义者喜欢假装没有任何古代文化相信进步，但他们当然都相信。

印欧文化中退化神话的一个版本围绕着金属的形象展开：金、银、青铜、铁。但是克罗诺斯和泰坦被摧毁为宙斯和奥林匹斯让路的神话呢？——一个与提亚马特和马杜克或利维坦和贾赫相似的故事。在这些“进步”神话中，较早的混沌地球（或水）“女性”万神殿被后来精神化的有序天堂“男性”万神殿取代（推翻）。这不是时间上的进步吗？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不是都声称比异教更好吗？

事实上，当然，这两个神话——复古和进步——都服务于控制和控制社会的目的。两人都承认，在目前的事态之前，存在其他东西，一种不同形式的社会。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似乎都看到了旧石器时代的“种族记忆”愿景，即人类伟大的、长期不变的前史。在一个案例中，那个时代被视为一种极其残酷的巨大混乱；18世纪并没有发现这种观点，但发现它已经在古典和基督教文化中表达出来。在另一种情况下，原始被视为比现在更珍贵、更纯洁、更快乐、更容易，比现在更神圣——但不可逆转地消失了，除非通过死亡才能恢复。

因此，对于所有忠诚和热心的秩序信徒来说，秩序呈现出比任何原始混沌都完美得多的存在；而对于秩序的心怀不满的潜在敌人，秩序将自己表现为残酷和压迫（“铁”），但完全和致命地不可避免——事实上，无所不能。

在这两种情况下，秩序的神话诗人都不会承认“混沌”或“黄金时代”可能仍然存在于现在，或者它们确实存在于现在，事实上，此时此地——但被社会的虚幻整体所压制秩序。然而，我们相信“旧石器时代”（与“混沌”或“黄金时代”一样，既不是神话也不是传说）即使在现在也确实作为一种社会中的无意识而存在。我们也相信，随着工业时代的结束，伴随着新石器时代最后一次“农业革命”的结束，以及最后一批秩序宗教的衰落，这种“被压抑的物质”将再次被揭露。当我们谈到“精神游牧”或“社会的消失”时，我们还能指什么？

现代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回归旧石器时代，而是旧石器时代的回归。

后古典（或后学术）人类学让我们为被压抑者的回归做好了准备，因为直到最近我们才开始理解和同情狩猎/采集社会。拉斯科的洞穴恰好在需要被重新发现时被重新发现，因为古罗马、中世纪的基督教或18世纪的理性主义者都无法发现它们美丽或重要。在这些洞穴（意识考古学的象征）中，我们找到了创造它们的艺术家；我们发现他们是祖先，也是我们自己，活着和现在。

保罗古德曼曾将无政府主义定义为“新石器时代的保守主义”。机智，但不再准确。无政府主义（或至少本体论的无政府主义）不再同情农民农业主义者，而是同情狩猎/采集者的非权威社会结构和前剩余价值经济学。此外，我们不能将这种同情描述为“保守的”。一个更好的词是“激进的”，因为我们已经在旧石器时代找到了自己的根源，这是一种永恒的存在。我

们不希望回到过去的物质技术（我们不想将自己炸回到石器时代），而是希望恢复我们忘记拥有的精神技术。

我们发现拉斯科美丽的事实意味着巴比伦终于开始沦陷。无政府主义可能更像是一种症状，而不是这种消退的原因。尽管我们有乌托邦式的想象，但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至少，我们已经准备好进入未知世界。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次冒险，而不是世界末日。我们欢迎混沌的回归，因为伴随着危险而来的是——终于——创造的机会。

**正式开始前**

艺术有什么好玩的？

艺术被达达笑死了吗？或者，也许这种除虫发生在更早的时候，在 Ubu Roi 的第一次表演中？或者是波德莱尔那讽刺的歌剧魅影般的笑声，让他的好资产阶级朋友如此不安？

艺术的有趣之处（尽管它比有趣的哈哈更有趣-特别）是看到拒绝躺下的尸体，这个僵尸狂欢节，这个与资本息息相关的木偶戏（臃肿的迭戈里维拉风格 plutocrat），这个垂死的幻影疯狂地抽搐着，假装自己是宇宙中唯一一个最真正有生命的东西。

面对这样的讽刺，双重性如此极端以至于无法逾越的深渊，任何艺术中的笑声的治愈能力都只能被怀疑，自封的精英或伪前卫的虚幻属性。要拥有真正的前卫，艺术必须要去某个地方，而这种情况早已不复存在。我们提到了里维拉；在我们这个世纪，肯定没有更多真正有趣的政治艺术家画过——但帮助什么？**托洛茨基主义！二十世纪政治的死胡同！这里没有治愈的力量——只有无力的嘲讽空洞的声音，在深渊上回荡。**

为了治愈，首先要摧毁，政治艺术要摧毁其笑声的目标，最终却加强其试图攻击的力量。“杀不了我的东西会让我更强大，”戴着闪亮礼帽的猪形人物嘲笑道（当然是嘲笑尼采，可怜的尼采，他试图笑死整个 19 世纪，但最终变成了一具活尸，他的妹妹用绳子绑住他的四肢，让他为法西斯跳舞）。

这个过程没有什么特别神秘或形而上学的。环境，贫穷，曾经迫使里维拉接受委托来到美国并为洛克菲勒画一幅壁画！- 华尔街猪肉的原型！里维拉让他的作品公然成为委员会宣传的一部分——然后洛克菲勒把它抹杀了。好像这还不够好笑，真正的笑话是，洛克菲勒本可以通过不破坏艺术、室内设计师的无牙寄生虫、那个笑话来更甜蜜地品尝胜利。

浪漫主义的梦想：资产阶级价值的现实世界可以以某种方式被说服去消费，将一门起初看起来像所有其他艺术的艺术（读的书，挂在墙上的画等），但它会用别的东西偷偷地感染那个现实，这会改变它看待自己的方式，颠覆它，用革命性的艺术价值取而代之

这也是超现实主义梦想。就连达达，尽管表面上表现出冷嘲热讽，但仍然敢于抱有希望。从浪漫主义到情境主义，从布莱克到 1968 年，每个成功的昨天的梦想变成了每个明天的客厅装饰——购买、咀嚼、复制、出售、委托给博物馆、图书馆、大学和其他陵墓，被遗忘、丢失、复活，变成了怀旧热潮，复制，出售等，等等，令人作呕。

为了理解 Cruikshank、Daumier、Grandville、Rivera、Tzara 或 Duchamp 是如何彻底地摧毁了他们那个时代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我们必须将自己埋在大量的历史参照物或幻觉中，因为事实上，笑的毁灭在理论上是成功的，但实际上是失败的——幻觉的重负在狂笑中连一英寸都没有移动，一阵大笑。崩溃的毕竟不是资产阶级社会，而是艺术。

鉴于对我们所玩的把戏，在我们看来，当代艺术家似乎面临着两种选择（因为自杀不是解决办法）：继续，一个接一个的攻击，一个接一个的动作，希望有一天（很快）“那个东西”会变得如此虚弱，如此空虚，以至于它会蒸发并让我们突然独自一人在田野里；或者，二，现

在就开始活得好像已经打赢了一样，好像今天的艺术家不再是一种特殊的人，而是每个人都是一  
一种特殊的艺术家。（这就是情境主义者所说的“艺术的压制与实现”）。

这两种选择都非常“不可能”，以至于对其中任何一种采取行动都是一个笑话。我们不必  
制作“有趣”的艺术，因为仅仅制作艺术就足够有趣了。但至少这将是我们的笑话。（谁能确  
定我们会失败？“我喜欢不知道未来”——尼采。然而，为了开始玩这个游戏，我们可能必须为  
自己设定一些规则：

1. 没有议题。没有任何诸如性别歧视、法西斯主义、物种歧视、外表主义或任何其他“特  
许经营问题”之类的东西可以从社会情结中分离出来，并以“话语”作为“问题”来对待。只  
存在将所有这些虚幻的“问题”纳入其话语的完全虚假中的整体性，从而将所有观点，赞成和  
反对，都变成了可以买卖的思想商品。而这种整体性本身就是一种幻觉，一场邪恶的噩梦，我  
们正试图（通过艺术、幽默或任何其他方式）从中唤醒。

2. 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必须尽可能地在整体所建立的心理/经济结构之外进行，作为  
艺术游戏的允许空间。你问，我们如何在没有画廊、代理商、博物馆、商业出版、NEA 和其  
他艺术福利机构的情况下谋生？哦，好吧，人们不必要要求不可能的事情。但人们确实必须要求  
“不可能”——否则为什么他妈的是艺术家？！占据一个名为艺术的特殊神圣猫鸟座位来嘲笑  
“方形”世界的愚蠢和不公正是不够的。艺术是问题的一部分。艺术世界已经抬头，它已经变  
得有必要脱离接触——否则就生活在一个充满垃圾的风景中。

3. 当然，一个人必须以某种方式继续“谋生”——但最重要的是谋生。无论我们做什么，  
无论我们选择哪个选项（也许是所有选项），或者无论我们做出多么严重的妥协，我们都应该  
祈祷永远不要将艺术误认为是生命：艺术是短暂的，生命是漫长的。我们应该努力做好漂泊、  
游牧、脱网、永不安定、经历多种艺术的准备，让我们的生活比我们的艺术更好，让艺术成为  
我们的吹嘘而不是我们的借口。

4. 治愈的笑声（与有毒和腐蚀性的笑声相反）只能来自一种严肃——严肃——但不清醒  
的艺术。毫无意义的病态，愤世嫉俗的虚无主义，时髦的后现代轻浮，抱怨/埋怨/呻吟（对“受  
害者”的自由崇拜），疲惫，鲍德里亚讽刺性的超顺从——这些选择都不够严肃，同时也没有陶  
醉到足以让适合我们的目的，更不用说引起我们的笑声了。

**“原始视觉”**



天真的艺术、原始艺术、疯狂或古怪艺术的类别，遮蔽了新原始或城市原始艺术的各种和进一步的类别——所有这些对艺术进行分类和标记的方式仍然毫无意义：——也就是说，不仅最终无用，但本质上也是无感的，与身体和欲望无关。所有这些艺术形式的真正特征是什么？不是他们相对于主流艺术/话语的边缘性？！如果我们要说当前正在发生“后现代主义”话语，那么“边缘”这个概念就不再具有任何意义。然而，后现代主义甚至不会承认任何形式的任何话语的存在。艺术陷入沉寂。没有更多的类别，更不用说“中心”和“边缘”的地图了。啊！但至少我们摆脱了所有这些狗屎，对吧？

错误的。因为有一个类别幸存下来：资本。为时已晚的资本主义。景观、模拟、巴比伦，随便你怎么称呼它。所有的艺术都可以根据这种“话语”来定位或贴上标签。正是并且仅在与这种“形而上学的”商品景观相关的情况下，“局外人（outsider）”艺术才必须被称为即时的（im-mediate）。它没有通过景观的准媒介。它仅适用于艺术家和艺术家的“直接随行人员”（朋友、家人、邻居、部落）；它只参与积极互惠的“礼物”经济。因此，只有这种非范畴与类别的“即刻主义”才能充分理解和捍卫“局外人”艺术的身体方面，它与感官和欲望的联系，以及它对景观艺术中固有的中介/异化的回避甚至无知。康复和繁殖。请注意，这与任何局外人流派的内容无关，也与作品的形式或意图无关，也与艺术家或艺术接受者的天真或知识无关。它的“直接性”仅仅在于它的想象生产方式。它在人与人之间进行交流或“给予”，正如苏菲所说的“乳房对乳房”，而不通过景观的超媒介的扭曲机制。

当南斯拉夫或海地或纽约涂鸦艺术被“发现”和商品化时，其结果未能满足以下几点：——（1）就“艺术世界”的伪话语而言，都是所谓的“幼稚”注定要保持古朴，甚至是野蛮，而且绝对是边缘化的——即使它的价格很高（一两年）。局外人艺术被迫进入商品景观是一种耻辱。（2）作为商品的康复使艺术家参与“负互惠”——即艺术家首先“获得灵感”作为免费礼物，然后直接“捐赠”给其他人，他们可能会或可能不会“回馈”他们的理解，或神秘，或火鸡和一桶啤酒（积极的互惠），艺术家现在首先为金钱创造并接受金钱，而“礼物”交换的任何方面都退居第二层次的意义并最终开始消退（负互惠）。最后，我们有了旅游艺术，以及那些不再为“不真实”买单的人的居高临下的娱乐，然后是居高临下的无聊。（3）否则艺术界会吸食外来者的能量，吸干一切，然后将尸体传送到广告界或“流行”娱乐界。通过这种复制，艺术最终失去了它的“光环”，萎缩并消亡。诚然，“乌托邦的痕迹”可能仍然存在，但本质上艺术已被出卖。

“疯狂”或“新原始”艺术等术语的不公平之处在于，这种艺术不仅是由疯狂或无辜的人创作的，而是由所有逃避超媒介异化的人创作的。它的真正吸引力在于它通过直接想象的存在而获得的强烈光环，不仅在于它的“有远见的”风格或内容，而且最重要的是它的存在性（即，它在“这里”，它是一个“礼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比后现代时代的“主流”艺术更高而不是更崇高——后者恰恰是一种不在场的艺术，而不是在场的艺术。

对待“局外人”艺术的唯一公平方式（或“美丽方式”，如霍皮人所说）似乎是将其“保密”——拒绝对其进行定义——将其作为秘密传递给个人-人，从乳房到乳房——而不是通过准媒体（光滑的期刊、季刊、画廊、博物馆、咖啡桌书籍、MTV 等）传递它。或者甚至更好：——让我们自己变得“疯狂”和“无辜”——因为当我们不再崇拜或批评它时，巴比伦会给我们贴上标签——当我们忘记它（但没有“原谅”它!），并记住我们自己的预言的自我，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真实意志”。

# 即刻主义者的赠礼节

# 1

任何号码都可以播放，但号码必须预先确定。六到二十五似乎是对的。

## 2

基本结构是宴会或野餐。每个玩家必须携带足够数量的盘子或瓶子等，以便每个人至少获得一份。菜肴可以在现场准备或完成，但不应购买现成的东西（葡萄酒和啤酒除外，尽管这些最好是自制的）。菜肴越精致越好。努力让人难忘。菜单不必让人感到意外（尽管这是一个选项）——一些团体可能希望协调宴会以避免重复或冲突。也许宴会可以有一个主题，每个玩家可以负责给定的课程（开胃菜、汤、鱼、蔬菜、肉、沙拉、甜点、冰、奶酪等）。建议主题：傅立叶的美食学——超现实主义——美洲原住民——黑与红（所有食物都是黑色或红色，以纪念无政府状态）——等。

# 3

宴会应具有一定的正式性：例如敬酒。也许以某种方式“穿着晚餐”？（例如，假设宴会主题是“超现实主义”；“晚餐着装”的概念具有一定的含义）。宴会上的现场音乐会很好，只要一些球员满足于为其他球员表演作为他们的“礼物”，然后再吃饭。（录制的音乐不合适。）

# 4

聚餐的主要目的当然是送礼。每个玩家都应该带着一件或多件礼物到达并带着一件或多件不同的礼物离开。这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a) 每位玩家带来一份礼物并将其传递给桌旁密封在他们旁边的人（或一些类似的安排）；(b) 每个人都为其他客人带来一份礼物。选择可能取决于玩家的数量，(a) 更适合较大的团体，(b) 适合较小的聚会。如果选择是 (b)，您可能需要事先决定礼物应该相同还是不同。例如，如果我和其他五个人一起玩，我会带（比如说）五个手绘领带，还是五个完全不同的礼物？这些礼物是专门送给某些人的（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可能会根据接受者的个性进行制作），还是会以抽签方式分发？

# 5

礼物必须是玩家自己制作的，不是现成的。这是至关重要的。预制元素可以用于制作礼品，但每件礼品本身必须是一件单独的艺术品。例如，如果我带了5条手绘领带，我必须自己给每条上色，无论是相同的还是不同的设计，尽管我可能被允许购买现成的领带来工作。



## 6

礼物不一定是实物。一个玩家的礼物可能是晚餐时的现场音乐，另一个可能是表演。然而，应该记住，在美洲印第安人的 potlatches 中，礼物被认为对送礼者来说是极好的，甚至是毁灭性的。在我看来，实物是最好的，而且它们应该尽可能地好——制造成本不一定很高，但确实令人印象深刻。传统的 potlatches 涉及赢得声望。玩家应该感受到一种竞争的奉献精神，一种制作真正辉煌或有价值的礼物的决心。团体可能希望事先为此制定规则——有些人可能希望坚持使用实物，在这种情况下，音乐或表演只会成为额外的慷慨行为，可以说是开胃小菜。

# 7

然而，我们的聚餐是非传统的，因为理论上所有玩家都赢了——每个人都平等地付出和接受。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一个沉闷或吝啬的玩家会失去声望，而一个富有想象力和/或慷慨的玩家会获得“面子”。在真正成功的聚餐中，每个玩家都会同样慷慨，所以所有玩家都会同样高兴。结果的不确定性为事件增添了一丝随机性。

## 8

提供场地的主持人当然会付出额外的麻烦和费用，因此理想的聚餐将成为每个玩家轮流担任主持人的系列赛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另一场声望竞赛将在系列赛中展开：谁将提供最令人难忘的款待？一些团体可能希望制定限制主人职责的规则，而另一些团体可能希望让主人自由地自我淘汰；但是，在后一种情况下，确实应该有一系列完整的事件，因此没有人需要相对于其他玩家感到被欺骗或优越。但是在某些地区和某些群体中，整个系列可能根本不可行。例如，在纽约，即使是小型聚会，也不是每个人都有足够的空间来举办。在这种情况下，东道主将不可避免地赢得一些额外的声望。那么为何不？

# 9

礼物不应该是“有用的”。他们应该诉诸感官。一些群体可能更喜欢艺术品，另一些群体可能更喜欢自制的蜜饯和调味品，或者黄金乳香和没药，甚至是性行为。应该就一些基本规则达成一致。礼物不应该涉及调解——没有录像带、录音带、印刷材料等。所有礼物都应该出现在聚餐“仪式”上——即没有其他活动的门票，没有承诺，没有延期。请记住，游戏的目的，以及它的基本规则，是要避免所有的中介，甚至是表象——要“现在”，要“赠礼”。

沉默

问题不在于透露的太多，而是每一个启示都找到了它的赞助商、首席执行官、每月的花哨、它的克隆犹太和替代人

你不会因为太多的知识而生病——但我们可能会因为知识的虚拟化、它与我们的疏远以及被一个奇怪的、迟钝的低能儿或拟像所取代——同样的“数据”，是的，但现在已经死了——就像超市里的蔬菜；没有气味。

我们的不适（1992年1月1日）由此产生：我们听到的不是语言而是回声，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语言的无限复制，它对自身反射系列的反映，甚至更加自我指涉和腐败。这个VR数据景观令人眼花缭乱的视角让我们感到恶心，因为它们没有隐藏空间，没有特权的不透明性。

无限获取知识，根本无法与身体或想象力互动——实际上是无肉无灵魂思想的摩尼教理想——现代媒体/政治作为纯粹的诺斯替精神，执政官和永世的麻醉沉思，选民的自杀……

有机物是秘密的——它像树液一样分泌秘密。无机物是恶魔般的民主——一切都是平等的，但同样毫无价值。没有礼物，只有商品。摩尼教人发明了高利贷。正如尼采所指出的，知识可以充当一种毒药。

在有机体（“自然”、“日常生活”）中嵌入了一种不只是愚蠢的沉默，一种不仅仅是无知的不透明——一种秘密，也是一种肯定——一种知道如何行动、如何行动的机智改变事物，如何呼吸。

不是“不知道的云”——不是“神秘主义”——我们不想再让自己陷入法西斯主义的蒙昧主义悲惨借口——尽管如此，我们可能会援引一种道家对“事物的真实性”的感觉——“一个花不说话，”当然不是生殖器赋予我们标识。（转念一想，也许这并不完全正确；毕竟，神话为我们提供了菲勒斯的原型，一个会说话的阳具。）神秘学家会问如何“工作”这种沉默——但我们更愿意问如何发挥它，喜欢音乐家，或者喜欢赫拉克利特的顽皮男孩。

每天都一样的坏心情。在这个平稳的时间里，什么时候会出现一些肿块？很难相信狂欢节，农神节的回归。也许时间在普莱罗玛这里停止了，在诺斯替的梦境里，我们的身体正在腐烂，但我们的“思想”被下载到永恒中。我们知道的太多了——我们怎么能不知道这个最令人烦恼的问题的答案呢？

因为答案（就像在奥迪隆·雷东的“Harpocrates”中一样）不是用复制的语言来回答，而是用手势、触摸、气味、狩猎的语言来回答。最后，美德是不可逾越的——吃喝就是吃喝——懒惰的乡巴佬犁出一条弯曲的犁沟。奇妙的知识世界已经变成了某种来自地狱的PBS特别节目。我要求我的溪流中有真正的泥浆，真正的豆瓣菜。为什么，当地人不仅闷闷不乐，而且沉默寡言——完全不交流。是的，外国佬，我们厌倦了你的steinking调查、测试和问卷调查。有些事情官僚不应该知道——所以有些事情甚至艺术家也应该保密。这不是自我审查，也不是自我无知。这是宇宙的机智。这是我们对有机物、它的不均匀流动、它的逆流和漩涡、它的沼泽和藏身处的致敬。如果艺术是“作品”，那么它就会变成知识，最终失去它的救赎力，甚至失去它的品味。但如果艺术是“游戏”，那么它既会保守秘密，又会告诉秘密，而这些秘密将

永远是秘密。秘密是为了分享，就像大自然的所有分泌物一样。知识是邪恶的吗？我们在这里不是镜像摩尼教——我们指望辩证法来打破几块砖。有些知识是数据，有些是商品数据。有些知识就是智慧——有些只是无所作为、无所求的借口。例如，纯粹的学术知识，或者虚无主义后模的知识，会逐渐进入不死者和未出生者的领域。有些知识让人喘不过气来——有些知识让人窒息。我们所知道的以及我们如何知道它必须以肉体为基础——整个肉体，而不仅仅是一罐甲醛中的大脑。**我们想要的知识既不是功利的，也不是“纯粹的”，而是欢庆的。**其他任何东西都是数据幽灵的集合，媒体的“招手公平的”，太晚期资本主义认识论的货物崇拜。

如果我能摆脱这种糟糕的心情，我当然会这样做，并带上你。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计划。越狱？隧道？用肥皂雕刻的枪，削尖的勺子，蛋糕里的锉刀？一个新的宗教？

让我做你的流浪主教。我们会玩弄沉默，让它成为我们的一部分。很快春天就来了。溪流中的一块岩石，分岔了它的湍流。观想它：苔藓、湿漉、翠绿，如同被闪电击中的雨玉褪色的铜。一只大蛤蟆，像活的翡翠，像五月天。身体的力量，就像弓或七弦琴的力量一样，在于弯腰。

# 倾听者的批判



说得太多而听不见——这已经够恶心的了。但是要获得听众——那可能会更糟。听众认为听就够了——好像他们真正的愿望是用别人的耳朵去听，用别人的眼睛看，用别人的皮肤去感受……

将改变现实的文本（或广播）：——兰波梦见了它，然后厌恶地放弃了。但他对魔法的想法太微妙了。粗略的事实也许是，文本只有在激发读者去观看和行动时才能改变现实，而不仅仅是观看。圣经曾经这样做过——但圣经已成为偶像。透过它的眼睛看就像拥有（在巫毒教的意义上）一尊雕像或一具尸体。

看，以及看的文学，太容易了。启蒙很容易。“做一个苏菲很容易，”一位波斯酋长曾经告诉我。难的是做人。政治启蒙比精神启蒙更容易，既不改变世界，也不改变自己。苏菲主义和情境主义——或萨满教和无政府状态——我玩过的理论——就是这样：理论、愿景、观察方式。值得注意的是，苏菲主义的实践在于重复单词（dhikr）。这个动作本身就是一个文本，只是一个文本。无政府情境主义的“实践”等同于：一个文本，墙上的一个口号。顿悟的一瞬间。好吧，它并非完全没有价值——但之后会有什么不同？

我们可能想清除我们的收音机中任何至少没有机会产生这种差异的东西。就像存在激发惊天动地的罪行的书籍一样，我们希望播放文本，使听众抓住（或至少抓住）上帝拒绝我们的幸福。劝告劫持现实。但我们更想清除生活中阻碍或拖延我们出发的一切——不是在阿比西尼亚出售枪支和奴隶——不是强盗或警察——不是逃离世界或统治世界——而是敞开心扉接受差异。

我与最反动的道德家一样，认为艺术真的可以以这种方式影响现实，我鄙视那些说所有艺术都应该被允许的自由主义者，因为——毕竟——它只是艺术。因此，我采取了保守派最讨厌的那些写作和广播类别的实践——色情和煽动性——希望给我的读者/听众和我自己带来麻烦。但我指责自己是无效的，甚至是徒劳的。变化还不够。或许一切都没有改变。

启蒙是我们所拥有的，甚至我们不得不从腐败的大师和笨手笨脚的自杀知识分子手中夺走。至于我们的艺术——除了为时尚创意和图像的鬼世界流血之外，我们还完成了什么？

写作已经把我们带到了写作可能不可能的边缘。任何能够在这个边缘的暴跌中幸存下来的文本——进入任何深渊或阿比西尼亚——实际上都必须是自创的，就像西藏神奇的藏宝空行母卷或道教的蝌蚪文精神符咒——绝对是白炽灯，就像女巫或异教徒在火刑柱上燃烧的最后尖叫信息（套用阿尔托的话）。

我能感觉到这些文本在面纱之外颤抖。

如果我们有一种情绪让我们放弃艺术的纯粹客观性和理论的纯粹主观性呢？去冒险深渊？万一没人跟着呢？那就更好了，也许——我们可能会在 Hyperboreans 中找到我们的平等。如果我们疯了怎么办？嗯——这就是风险。如果我们感到无聊怎么办？啊……

不久前，我们把所有的赌注都押在了奇迹会闯入日常生活中——赢了一些，然后输了很多。苏菲主义确实要容易得多。那么典当一切，直到最后的悲惨潦草？加倍我们的赌注？欺骗？

就好像隔壁房间里有天使在厚墙之外——吵架？他妈的？一个字都认不出来

我们能在这么晚的时候保留自己成为隐藏宝藏的发现者吗？通过什么技术，看到正是技术出卖了我们？感官的错乱、叛乱、虔诚、诗歌？知道如何是廉价的江湖郎中的把戏。但是知道什么可能是神圣的自我知识——它可能会从无到有地创造出来。

然而，最终，有必要离开这座在贫瘠的暮色边缘一动不动的城市，就像所有孩子都被引走后的哈梅林（Hamelin）一样。也许存在其他城市，占据相同的空间和时间，但是……不同。也许在丛林中，单纯的启蒙会被美洲虎的黑光所掩盖。我不知道——或者说，我很害怕。

中文无治主义图书馆 | 中文無治主義圖書館



Hakim Bey

即刻主义

1994

<https://theanarchistlibrary.org/library/hakim-bey-immediatism>

[zh.anarchistlibraries.net](https://zh.anarchistlibraries.net)